

导 言

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

中国经济现代化，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不自今日始。实际上，我们早已登上经济现代化的列车，为了更加主动地驾驭这一列车，我们有必要用发展的眼光、现代的技术、中国人的智慧，铸造驱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巨轮。

一、百年夙愿：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追求

按照现代化理论，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大致概括成两种不同的起源，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过程：一类是内源的现代化，称“内生型”，这是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其外来的影响居于次要地位；一类是外源的现代化，称“外生型”，这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了内部的思想 and 政治变革并进而推动经济变革的道路，其内部创新居于次要地位。中国走上通向现代化之路是由外力推动的，由于中国自身有十分根深蒂固的经济、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因而社会的变革更加困难，中国经济现代化呈现出举世罕见的漫长而崎岖的历程。

数千年来，中国人都是按“中国中心论”来认识世界。是两次鸦片战争使当时清政府认识了西方国家“船坚炮利”的威力，促使清廷从“以商制夷”转变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由此引起的

洋务运动揭开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序幕。洋务派创办近代工业由军用工业扩展到民用工业，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它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洋务运动中，开设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都由清政府控制。从企业的开办到经营的过程，均须清政府批准，其垄断权力带有法令的强制性。这种企业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操纵社会经济命脉，形成国家垄断的近代工业，其实质是借助西方国家及学习西方军事技术来维护和巩固天朝制度，而不是为了变革天朝制度。

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败。有识之士开始明白，局部革新和军械西化，即所谓船坚炮利，仍不足以图存，唯有广泛的社会政治变革，才是自救之道。1896年，康有为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在积极活动。1898年“百日维新”，在政治、军事、教育、实业诸方面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不久变法失败，表明改良主义的办法行不通。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不屈不挠，直到1911年推翻满清政府，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清除了封建政治的障碍。

尽管辛亥革命由于袁世凯的篡权而失败，但随着一大批新兴平民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中国知识界出现了追赶世界新潮流的活跃趋势，形成了现代思想启蒙运动的最大高潮。到“五四”运动前后，新思潮大量涌入，西化派异军突起，引起了“孔化”与“西化”的大辩论。西化派随之一分为二，形成“西化”与“俄化”两大派的斗争，从孔化派中也分化出现代化的新儒学。到30年代，从“中体西用”引伸出“中国本位”，从“西化”发展为“全盘西化”，又引起新的论争。在这些对立面的斗争中，初步形成了“现代化”的概念和新的“中国化”概念，最后达到一种朦胧的中国式现代化认识。后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爆发，全民族

的注意力转向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现代化课题的讨论中断了。

1949年全国实现了新的统一，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得到进一步发扬，出现了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有过重大失误，使中国经济现代化延误了过多的时间，但有一点应该肯定，那就是一切进步的阶级、阶层、政党、派别及学说和方案，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毫无疑问，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人心所向，是中国历史发展大势所趋。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追求，是现代中国人民百年夙愿，也是他们的利益所在。

二、商品经济：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巨轮

世界近现代史证明，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是推进现代化的两大巨轮。因此，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必须采取商品经济的经济形式。

尽管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前资本主义形态就已出现，但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它才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第一次成为产品的一般形式，不仅生产的剩余产品是商品，生活必需品也成了商品，各种不同的生产条件也都成为商品。一切生产活动表现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根据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矛盾，经典作家推断，未来社会商品经济将被消除，代之而起的将是产品经济。而各国社会主义实践却证明，由于国情不同，社会制度的跨越是可能的，但商品经济阶段却是不可逾越的。

纵观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它们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历史任务，都是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完成的。商品经济是迄今为止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种最有

效的社会形式。早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促使旧的生产方式瓦解了：农业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部门，经济作物的比重在不断扩大；更多的手工业的生产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独立工商城市大量地涌现于西欧各地，尤其是意大利北部和尼德兰等地。特别是 15 世纪末、16 世纪初的新航路的开通，美洲、亚洲和澳洲的发现和继之而来的新的世界市场的骤然形成，给当时的商业、运输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以强有力的推动。世界地理范围突然扩大，促成了国际贸易的重大突破——欧洲商业革命。大批冒险商人纷纷涌向能发财致富、通商贸易的地方，组织起众多的商业公司，从事掠夺性贸易和不平等交换。由此，欧洲的贸易市场迅速从环地中海区域扩展到非洲、亚洲、南北美洲及大洋洲。同时，进入国际流通领域的商品种类和数量激增，并开始出现了商品交易所、证券交易所等固定市场。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对西欧诸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它造成并扩大了对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促进了欧洲，特别是英国工场手工业和城市的兴旺发达。在强烈的市场需求刺激下，毛纺织业迅速发展成为遍布英国的“全民性产业”。在毛纺织业这一主导经济部门的启动下，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采矿、制盐、冶金等部门迅速扩散。

强大的市场需求与有限的生产能力的矛盾，最终必将导致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从 18 世纪 70 年代起，伴随着蒸汽的呼啸和机器的轰鸣，一场表面上极其平静，但实质却极为深刻的革命在英伦三岛发生了。半世纪以后，它迅速扩散到欧洲大陆和北美，形成了风靡世界的工业革命，即资本主义从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向以机器为主体的工厂制度，从农业占优势的经济向工业占优势的经济迅速过渡。这一变革，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终战胜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这次工业革命，加速了各

种原料加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形成了大量独立的生产部门和行业，一系列新的部门和行业在大机器工业的基础上不断涌现，工业、农业、商业等各生产大类的内部分工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凭借其创造出的巨大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把世界商品经济推向新的高度，西方各国的社会分工超出本土向国际领域拓展，国际分工体系开始形成。从此，商品经济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最终取代了自然经济。

商品经济与大工业生产的广泛发展，推动了技术和产业结构不断更新、革命。就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后不久，以电气、化工、炼钢等重工业部门崛起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便率先发生于美国和德国，尔后又涉及到世界各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产生了，殖民地经济对西方国家变得无比重要。所谓“工业欧美日、原料亚非拉”的国际分工，表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工业先进国组成的“世界城市”和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组成的“世界农村”的分工基础上的。在这一基础上，发达国家的商品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生产的专业化日益发展，第三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从而使社会分工日趋深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商品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以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海洋和空间技术为主的科技革命，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和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商品流通、资本输出、劳务交换、技术转让、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据有关资料统计，从 1860 年到 1970 年的 110 年中，美、英、法、德、日五国钢的总产量增长 128 倍，美国的国民收入增长 184 倍。科学技术发展也呈现加速趋势。据英国学者马丁估计，人类的科学知识，在 19 世纪每 50 年增加 1 倍，20 世纪中叶每 10 年增加 1 倍，70 年代每 5 年增加 1 倍，现在每 3 年就增加 1 倍。

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一旦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

成为社会经济的普遍形式，商品经济就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强有力杠杆，它是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巨轮。

三、中国经济现代化：现代文明的集合与体现

人类文明是劳动者以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创造的，它不仅体现于物质，也体现于精神和人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人类有史以来，文明的演进大约经过四个阶段：（1）原始农业文明，它是以青铜器、新石器为标志，主要是人力与畜力的运用；（2）由冶金革命开始的古典农业文明，它是以铁器为标志，主要是各种自然力的运用；（3）原始工业文明，主要以西欧中世纪后期的农业革命和商业革命为升进的标志；（4）发达工业文明，它是以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以大机器生产体系为标志，在这个文明阶段，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专业化与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已发展为全球性，在政治上则表现为社会的自治性与社会成员自主性的发展。^① 而从 19 世纪开始的全球性商品经济，其自身又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由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由不规范逐步走向规范。从总体上看，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本世纪 20 年代末大危机前的商品经济，可称为近代的商品经济，它的主要特征是自由竞争、自由放任。这种商品经济最初在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有较系统的论述。二是 30 年代大危机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日等国家经过调整，建立起新的商品经济机制和规则，迅速从危机和战后的废墟中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也得益于这种经济。我们把它

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称为现代商品经济，它是现代文明的集合与体现。

现代商品经济最早的社会载体是资本主义制度，它利用商品经济这种现代社会形式最终战胜了封建制度，并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但是，这种社会制度在推动文明发展的同时，也阻碍了这一发展。首先，广大脑力和体力劳动者作为文明主体，不仅以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创造了人类的文明，并以自己的存在和发展使文明得以延续和演进。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文明主体不能享受文明成果，劳动异化导致文明的异化，文明主体丧失了创造文明的主动精神，失去了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其次，由于少数非文明主体的资本家及从属于他们的国家机器，掌握着文明成果和文明演进的方向，也就使现代文明异化为资本增殖，而为此目的，不仅会生产出与文明发展方向相悖的大量物质和精神产品，造成文明的浪费，更会为资本扩张和增殖目的，发明和生产诸如核武器之类毁灭文明和文明主体的破坏力。

中国自秦、汉以来，在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官僚制度下，曾广泛而有效地将以农为本的文明在中华大地上普及。然而，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官僚制度，又以其伦理道德和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限制了商品经济发展，阻止了近代文明的普及。新中国的建立，推翻了以官僚政治为核心的旧制度，开始以加速度来学习和掌握现代文明，发展经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党和全国人民以中国经济现代化为中心任务，明确了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来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其实质就是要以非资本的社会形式，利用现代商品经济来发展现代文明，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

四、市场经济体制是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商品经济很早就产生了，它相对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社会的经济形态，是一般性范畴，其自身又经历了简单商品经济、近代商品经济和现代商品经济三个发展阶段。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商品经济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体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但由于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的差异，会导致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别。

纵观世界商品经济发展的漫长历史不难发现，专制式的统制经济体制、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集权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可称为命令经济体制，也是一种统制经济体制）都曾在不同国家的不同阶段，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在西方重商主义时期，专制式的体制扶持商业资本和手工业的发展。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靠专制统治将促进经济的作用发挥到极端，而亚洲“四小龙”腾飞也与专制政治有很大关系。统制经济体制（一般人们习惯称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生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相联系的，从前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到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似乎形成一种共识：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而前苏联和中国在短时期利用这种体制取得的显著效益又使这种信念得到强化。但是，不论是专制经济体制和名为计划经济体制而实为统制经济体制，它们在宏观上不能保证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归根到底是生产单位之间有效地配置资源；在微观上不能激励生产单位和劳动者在对他所掌握的资源作最有效的利用。所以，虽然这两种体制在一定的特殊时期对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不能长久。因为它们与商品经济及其价值规律本质要求是相矛盾的。

商品经济运行机制是价值规律正常发挥作用，其条件是市场

体系完善、市场信息真实、市场竞争平等，一句话，市场功能作用充分。追求利益的内在冲动和强大的竞争压力解决了稀缺资源最高效利用，而市场信息真实、快捷，又保证资源在动态中合理配置。因此，还价值规律作用的本来面目，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就成了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西方，这种要求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的。他指出，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去促进一种目标，从而在利己动机驱使下使生产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和最充分的利用。这种以自由竞争、自由放任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体制符合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对于打破封建制度的束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许多问题单靠市场力量是不能解决的，政府的干预仍然是推动经济运行发展中的一个基本力量。因此，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为有宏观调控为特征市场经济体制，就成为第二次大战后的一股世界性潮流。

需要指出的是，有控的市场经济体制不是专制式的体制和集权式的体制，也不完全否定自由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它坚持自由竞争和 market 价格的调节作用仍是实现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基本途径，强调政府干预是对市场经济的补充和完善而不是代替，不合理的政府干预应减少到最低限度。这种体制反映了社会化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因此是现代世界上效率最高的一种体制。

五、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和条件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在中国的决策层和理论界长期以来

都从制度意义上来界定市场经济，并把它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加以批判。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人的思路，从对西方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的考察，及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中，逐步发现市场经济的作用。认识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体制，主要作用是在经济结构及运行机制上。中国经济结构及运行机制存在诸多矛盾，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必须使这些矛盾得到解决。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看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

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表现在许多方面，这里固有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但更多的是集权式的统制经济体制所致。例如：农业长期落后，成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第三产业无序发展，加剧了流通中的矛盾；就业结构和分配结构不合理，导致了分配不合理；价格结构的矛盾，扭曲了市场信号；而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势必影响资源利用效率，如此等等。诸多的经济结构矛盾必然影响国民经济整体系统功能的发挥，使社会资源配置受到影响。

针对我国经济结构的矛盾，从 50 年代起我们一直在不断改革和调整，但其收效甚微，有时是某个结构合理了，却导致其它结构矛盾加剧。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在经济结构某个部位动的小手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结构问题。必须用系统的观点，在分析中国现代经济结构的矛盾基础上，揭示其内在运行机制。

经济结构诸多矛盾产生都与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有关。从信息机制方面说，在现代经济中，要保证资源配置决策正确，必须解决信息的收集、传输、处理等问题。从激励机制方面看，在商品经济中，只有保证资源配置由经济当事人自主作出，才能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促进整个经济增长。在集权式的统制经济体制下，计划机关不可能及时收集、传输、处理日新月异、千变万化的大量信息，而统一计划又扼杀了经济当事者的利益性。这样，

势必在资源配置上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进而造成经济结构矛盾长期不能得到解决。

用市场力量配置资源，是通过市场这个由千千万万商品经营者之间按一定规则进行的交易活动交织而成的灵巧机器实现的，因而能克服统制经济体制下决策权力过分集中的缺点，又不致出现混乱无序状态。第一，从信息机制看，市场对各种经济活动所表现出来的信号，具有灵敏、机动的反映，每个经济主体都可以分享分散发生在整个经济各个角落的供求信息，从而解决了社会化大生产中信息广泛发生同集中处理的需要之间矛盾。第二，各市场主体根据市场信息进行自我决策，在均等机遇和公平竞争条件下，实现优胜劣汰，以保证资源有效利用。可见，我国经济结构中所存在的矛盾，可以通过利用市场机制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因此，认真学习和借鉴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国家有关市场机制的一般理论，结合中国特殊国情创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十分必要的。

市场经济以自由竞争为特征发展为有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经历了几百年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各国根据自己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和生产水平等国情创建了市场经济不同的体制模式，这些模式为我们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经验。中国不可能随意选择某种体制模式，必须考虑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中国的各种国情，创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从前苏联学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质是统制经济体制。我们曾受惠于它，但更多的是受制于它，因此，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须改革旧的体制。然而改革旧体制并不是不要计划和政府，特别是像我们这么一个处于现代化“大冲刺”时期的大国，政府必要的干预和计划仍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历史上曾有管理大国的经验，在现代又在实践中

体会到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的必要性，可以说，这对创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是一个重要条件。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文明主体对现代文明成果的追求是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关键的条件。市场经济体制是由广大文明主体创造的文明成果，它是世界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不是哪个部门、哪位官员制定的政策，它首先是由文明主体对现代文明成果追求而形成的必然结果。从 80 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到 1984 年城市改革，再到 90 年代初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都是由广大人民积极参加，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本身发展相统一的一场追赶世界现代化的革命。因此，以国情为基点，以现实为对象，创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其实质就是文明主体——广大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选择自身利益最能体现的现代形式，即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现代文明成果的过程。

第一篇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障碍和动力

现代化是文明主体创造人类现代文明的过程，其实质就是通过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不断地认识和解决人类在当代所遇到的社会矛盾，向人类文明的一个新时代目标演进的过程。

研究中国经济现代化，必须以中国经济矛盾为出发点。然而，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当我们分析和解决中国现实矛盾时，不能不从历史的长河中去探根寻源。

对社会主义，需要一个认识过程。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使中国经济的腾飞达到应当达到的水平，既有理论上的误导，也有体制上的错位。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片面理解和对前苏联产品经济计划体制的照搬，延缓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经济现代化是亿万国民参加的伟大事业，充分调动文明主体——广大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聪明才智，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

本篇就是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矛盾的反思，说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障碍是因为商品经济不发达，而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动力在于文明主体。

第一章

从历史长河中寻源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要提高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为现代文明体现的商品经济已经在世界上存在几百年，然而在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商品经济并不发达，这里固然有现实条件的制约，但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历史是现实的渊源。因此，当我们探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时，必须把研究的镜头拉长，在历史长河中寻找障碍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遗传密码”。

一、以农为本的经济模式

中国向来是以农立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重视农业生产，帝王们也都有耕籍田、祷求雨、劝农事的仪式和措施。中国的农技也较发达，农具的制作、牛耕的发明及农书的刊行等，都曾领先于世。农业经济发展早、比重大，这是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重要特点。

以农为本的经济模式是与中国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相联系的。中国是地处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的大陆国家，西部的高山巨川和青藏高原，像天然的屏障，蒙古高原雄踞北部，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环抱东部。这种地理环境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造成一定的封闭状态。而内部长江、黄河流域形成的平原，土

质肥沃，结构疏松，宜于耕种，加之雨量充沛，气候适宜，是农业生产需要的良好生态环境，这对于生产工具比较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的中华民族，无疑提供了最经济的生活资料来源。所以，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很早就开始从事农业，并把它发展成几乎是唯一的、排他性的产业。

特殊的地理环境为先民们从事农业提供了自然基础，历史地看，以农为本的经济结构也对当时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繁荣起了积极作用。

与畜牧业经济相比，农业经济能够取得较稳定的经济收获，保证人们最必要的衣食之需。同时，农业经济本身具有因地制宜的多样性和季节性强的特点，包含着比较广阔的生产途径，从而促使社会劳动沿着农业生产的方向不断向深度和广度进军。另外，正是因为我们的先民以农立国，籍田亩，劝农桑，不断地调整土地制度，又在自己培植作物的基础上不断吸取外来的农作物，才使我国的农业由西向东，由北向南逐渐得到全面发展，它不仅承担着人口的巨大压力，也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繁荣，从而写下了世界古代史中最光辉、最灿烂的篇章。

以农为本的模式对历代统治阶级政权的稳定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受到特别的重视。大禹治水“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敢入。……卑宫室、致费于沟洫”^①而建夏朝即帝位。殷人的祖先契，由于“佐禹治水有功”被帝舜“封于商”。^②周人的祖先弃，在帝尧时期就担任“农师”使“天下得其利”。^③史书上这些记载，表明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夏、商、周以后，一直到后来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农民上缴给统治者的田赋，在财政收入上一向

《史记·夏本记》。

《史记·殷本记》。

③ 《史记·周本记》。

被称为“正供”。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里，这种“任土作贡”的财政榨取，对统治阶级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同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狭小的生活空间以及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性，也为统治阶级巩固政权提供了便利条件。

以农为本的经济结构也使中华民族创造了独特灿烂的文化。尽管农业经济使历史文化带有封闭性和保守性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方面，但许多方面，如世代相承的爱国主义精神、原始的民主思想、崇尚“爱人”的人道主义思想、“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等等，都是中国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世界文明的宝贵精神财富。

历史已证明，“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①，人类的“一切劳动首先而且最初是以占有和生产食物为目的的”。^②农业的发展，不仅关系到人口的增减和国力的强盛，而且还制约着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然而，农业的作用是以它能给整个国民经济提供基础为前提，当农业以排他式方式发展时，结果往往相反。古代中国传统农业尽管在二千多年前就领先于世，但以后发展却十分缓慢，农业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形式、生产力的水平，中国近代与古代几乎基本相同。正像英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描述的那样：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5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13页。

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①

造成这种落后状况的原因仍应从中国特有的以农为本的经济结构中去寻找。

首先，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排斥社会分工。社会分工是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力，它不仅孕育了新的部门、新的产业，而且也可以反过来带动农业的发展过程。但是中国的农业经济是以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小农经济为主要形式和以家庭为最基本生产单位为特征的。家庭既是消费单位，同时又是生产单位。男耕女织型简单的自然分工，包括了生产、分配、消费的全过程。这种实行种植业、纺织业、家庭饲养业和家庭手工业多种经营的小农家庭，几乎提供了全部必需品。小农经济这种稳固性和封闭性，把社会分割为千千万万个互不相干的个体，它们只知道离开社会分工依然可以生存下去，却不了解社会分工的巨大威力。从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以后一直延续到近代，世世代代的小农经济，世世代代的简单再生产，成为商品经济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

其次，小农经济又是我国人口久兴不衰的根本原因。在中国以农为本的经济模式下，由于两性体力差异的自然分工，形成男耕女织的个体家庭生产方式和手工劳动，产品的取得主要靠体力支出和运用工具的技术熟练程度，增加劳动总量成为发展生产最基本的途径，这本身就有着对人口增殖不可遏制的冲动；同时，男耕女织，家庭生活稳定又为人口增殖提供了保护条件。因此，在中国近代社会以前，人口增长曾经出现过四次高峰：第一次高峰在战国时期，人口约达 2000 万人；第二次高峰在汉、唐两朝，人口保持在 3000 万至 5000 万之间；第三次高峰在宋朝到明朝，人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1972 年版，第 65 页。